

#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中的观音图像与信仰研究\*

◎ 陈粟裕

**内容提要：**随着吐蕃在青藏高原的崛起，8世纪后半叶至842年，河西、敦煌以及丝绸之路西域南道的部分地区先后为吐蕃人所统治。在这个战争频繁、多民族相互交流的特殊时期，救难拔苦的观音菩萨成为民众重要的精神寄托。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以及藏经洞出土的文书、绢纸画保存了这一时期多个民族的关于观音信仰的图像与文献。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解读，我们可以厘清观音图像的前后传承、与西域、吐蕃在观音信仰上的交流、从吐蕃传入的新的菩萨样式几条线索，从而展示吐蕃统治时期观音信仰的状况。

**关键词：**观音信仰 敦煌石窟 吐蕃 于阗

**作者简介：**陈粟裕，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 一、吐蕃统治河西、西域时期

755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42—797）即位之后，迅速充实了吐蕃的军事实力。755至763年的“安史之乱”使得中原军事混乱，吐蕃大军在此时乘虚而入，向东攻占至凉州、甘州、肃州等地，“从八世纪末叶开始完全控制了整个天山南路地区，而且此时吐蕃对于中亚的统治，由于控制了东部的河西地区，和西部的帕米尔地区，是相当稳定的。”<sup>①</sup>直至842年，吐蕃末代君主朗达玛（约838—842在位）遇刺，吐蕃在河西、西域的力量随之瓦解。

在这个时间段中，笃信佛教的吐蕃王朝与两个区域在宗教与艺术上产生深入的互动与交流，一个为位于河西走廊的敦煌，一个为位于丝绸之路西域南道上的大乘佛地——于阗。敦煌石窟在此期间开凿、图绘的57个洞窟<sup>②</sup>以及藏经洞发现的大量的古藏文、汉文文献以及绢纸画，为我们生动展示了这一时期丰富的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状况。791年<sup>③</sup>吐蕃占领于阗，面对这个佛法与艺术的昌盛之所，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于阗的建筑、佛教造像样式，关于于阗的佛教与历史也在古藏文中保留了下来。吐蕃、于阗与敦煌三个区域的交流，同样在石窟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有所体现。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自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沿着丝绸之路传播而来。286年竺法护所译的《正法华经》中的《光世音普门品》中即是宣扬观音救难的内容。在此后，对观音菩萨的祈祷与礼赞，逐渐延伸至社会的各个角落，从魏晋南北朝至明清、乃至当代，绵延不绝，除了“普门品”中宣扬的救难思想外，往生净土、治病、求子等等亦逐渐成为民众对观音菩萨的冀求。而吐蕃统治时的敦煌、西域则体现了汉、藏、印等地在观音信仰上的交流。

\*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古时期佛教在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传播与图像呈现研究”（16CZJ011）阶段性成果。

① [日本]森安孝夫：《吐蕃在中亚的活动》，劳江译，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 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76—94页。

③ 斯坦因于安迪尔古城E.I佛寺发现题记“□元七年……至建闻其兵马使死及四镇大蕃……和大蕃官太常卿秦嘉兴归本道”。记录了于阗被吐蕃占领的情况。法国汉学家沙畹判断为开元七年（719）。开元前后，于阗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且E.I佛寺中发现大量藏文文书，为吐蕃人长期居住于此的证据。故而此题记当为古城贞元七年（791）更为合理。

针对这一时间段观音菩萨的图像研究包括：

(一) 唐代敦煌石窟中的观音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图像。罗华庆对洞窟中的观音经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sup>①</sup> 台湾学者潘亮文讨论了敦煌观音图像的发展脉络。<sup>②</sup> 之后沙武田、王惠民、张景峰等人对某个洞窟中的观音像或“普门品”的题材或年代进行了考订<sup>③</sup>，并挖掘了观音信仰在敦煌的发展状况。

(二) 密教观音图像。关于密教观音图像的研究以彭金章先生为代表，他在一系列论文中，分别对各类密教观音经变进行了研究。主要将敦煌密教经变中的人物与经典对读，判断眷属身份，并认为这些密教观音经变并不是严格遵循经典绘制。

(三) 观音图像体现的河西、吐蕃、西域交流。包括张清涛的《试论早期吐蕃的观音信仰与周边地区的关系》<sup>④</sup>、刘颖的博士论文《敦煌莫高窟吐蕃后期经变画研究》<sup>⑤</sup> 等对民族交流与观音图像均有涉及。李翎的一系列关于汉藏交流的观音图像研究也很值得重视<sup>⑥</sup>。

## 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观音图像

安史之乱以后，河西地区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特别是八世纪后半叶汉军与吐蕃军的长期拉锯战使得百姓民不聊生。甚至到九世纪初，瓜沙二州的民众起义依然层出不穷。在这种状况下，救难护生的观音菩萨成为百姓们寻求庇佑的对象，格外受到尊崇。藏经洞中出土的这一时期经卷中，与观音直接相关的汉文佛经有：《观音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圣观自在菩萨一百八名经》等 27 件<sup>⑦</sup>。

对于观音菩萨的信仰也在藏族民众中根深蒂固，古藏文文献中观音直接相关经典包括有《佛说观自在一百八名梵赞》《一切佛舍利宝篋圣观自在一百八名颂》《圣观自在十一面神咒陀罗尼》（《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等。

从几件汉、藏文能够判断年代的经卷中，可见民众抄写或出资抄写观音经典的发心：S.2992《观世音经》题记：“清信弟子女人贺三娘，为落异乡，愿平安，申年五月三日写。”北冈字 84《观世音经》题记：“辛丑年（821）七月廿八日，学生童子唐文英，为妹久患，写毕功记。”此外斯坦因收集的古藏文《阿弥陀经》写本结尾的藏文题记也有吐蕃官员供养《阿弥陀经》、《观音经》等经典，祈求返回故里并往生神的国度的内容。<sup>⑧</sup>

显然，向观音菩萨祈祷的信徒，有保平安、救难、疾病愈，乃至魂归故里、往生净土等

① 罗华庆：《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敦煌研究》，1987年10月。

② 潘亮文：《试论敦煌观音像之形成与发展》，敦煌研究院编《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石窟艺术卷》，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参见王惠民《莫高窟第205窟施宝观音与施甘露观音图像考释》，《敦煌学辑刊》2010年4月；沙武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与“观音经变”图像》，《法音》，2011年3月；沙武田：《莫高窟45窟观音经变时代新探》，《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张景峰：《图像角色的转换与形成——以敦煌石窟观音经变为中心》，《石河子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④ 张清涛：《试论早期吐蕃的观音信仰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

⑤ 刘颖：《敦煌莫高窟吐蕃后期经变画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10年。

⑥ 如《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试论新疆地区的密教信仰——以千手千眼观音图像为例》等，均收录于李翎《佛教与图像论稿》《佛教与图像论稿续编》两本论文集，2011、2013年，文物出版社。

⑦ 参见赵晓星：《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7年3月；刘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观音信仰》，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⑧ [日本]高田时雄：《五姓说在敦煌藏族》，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756—767页。

愿望。而这些愿望投射在敦煌石窟之中，则有如下体现：

### （一）单身观音像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在吐蕃与瓜沙二州长达十余年的争战中，莫高窟盛唐洞窟的营建因战事而逐渐中断，战事过后，对于这些未完成的洞窟进行了补绘。绘制单身尊像则是填补石窟空白的最佳选择。这一时期常见的补绘尊像有药师佛、天王、地藏、菩萨等，特别是观音菩萨，数量尤多<sup>①</sup>。如以雕塑而闻名的45窟，西龕内雕塑、壁画皆完成于盛唐时，在西龕的北侧则补绘了一身观音菩萨。这身菩萨头戴金属质“山字形”头冠，翠眉、斜披僧祇支，为典型的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菩萨风格，与窟内盛唐风格的菩萨像截然不同，其下有题记为“清信佛弟子索滔为……世音菩萨一躯一心供……”。当为功德主索滔单独施资绘制。在180窟中则出现了不同年代的功德主单独供养的菩萨像，西龕外南侧菩萨旁有题记：“清信佛弟子张承庆为身染患发心造二菩萨……天宝七载五月十三日毕功”；南壁西侧观音像侧则有供养人题名“观世音菩萨弟子阚日荣奉为慈亲蕃中隔别敬造……”。亲人“蕃中隔别”是吐蕃与河西争战时的普遍现象，功德主阚日荣因此向观音菩萨祈祷，体现了在战争年代民众寄托于观音菩萨特殊希冀。

与单尊观音像同时流行的还有对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表现。吐蕃统治时期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有三种表现方式，一种是以观音为主尊，将普门品的情节分散在观音两侧，如45窟（封二图1）、112窟、126窟、185窟、472窟等，第二种龕内屏风画上表现观音救八难的7窟、93窟<sup>②</sup>、西千佛洞18窟，虽龕内塑像不存，但根据龕内壁画为观音无疑。另一种是在《法华经变》的下方，以屏风画的方式绘制“普门品”的内容，如159窟、231窟、237窟等。在这些普门品的情节中，通常一个画面一个情节，有的以山水背景相连，将观音救难的场景逐一展开，以图解经，让观者对观音愿力一目了然。

### （二）密教观音经变

7世纪前后，随着大量修习密教的僧人聚集长安、洛阳，密教经典翻译众多，两京地区逐渐成为汉地密教的中心。初唐的敦煌石窟就已经出现了密教观音像，如321窟、340窟的十一面观音，皆为长安传入的样式。天宝十一年（753）应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邀请，不空前往河西弘扬密法，观音类的密教图像在敦煌石窟中逐渐盛行。大历十一年（776）开凿的148窟首次出现了完备的如意轮观音、不空羼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封二图2）。吐蕃统治敦煌之后，由于吐蕃本土与敦煌密教处于同一阶段：以陀罗尼密教和持明密教为主，所以这一时期的洞窟内的密教观音图像基本延续着汉传密教菩萨造像的体系<sup>③</sup>。

从现有的分期来看，吐蕃统治敦煌前期的密教菩萨经变较少仅197窟一例，5个洞窟用这类题材的壁画进行了补绘<sup>④</sup>，而到了以821年为界的吐蕃统治后期，敦煌的世家大族继续在莫高窟进行石窟开凿，石窟布局有统一的规划与设计，形成了如意轮观音经变、不空羼索观音经变相对；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千手千钵文殊相对应的格局。这一类图像通常由主尊与安布在四周的眷属构成，但是主尊与眷属的组合与经典的记载并不吻合，并且，不同的主尊可以拥有同样的眷属，充分展示了具有礼拜意义的观音类密教图像与严格修持的密宗仪轨间的差别。敦煌文献中关于密教观音信仰的抄本中也有将不同密教观音眷属融合为一的情况，

① 参见沙武田《莫高窟盛唐未完工中唐补绘洞窟之初探》，《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第17页。

② 赵蓉：《莫高窟第93窟龕内屏风画内容新释》，《敦煌研究》，2012年第1期，第25—32页。

③ 刘颖：《敦煌莫高窟吐蕃后期经变画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10年。

④ 郑炳林、沙武田编著：《敦煌石窟艺术概论》，第九章“莫高窟‘盛唐未完工、中唐补绘’洞窟研究”部分，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年。

如 P.2153 《观世音菩萨如意轮陀罗尼章句咒并别行法》就是摘取多种经典，结合密典轨法写成。<sup>①</sup>

从各类观音写经中宣扬的功德来看，彼此之前的区分也并不明显，如《不空绢索神咒心经》《观世音菩萨秘密藏如意轮陀罗尼神咒经》《千手经》等等都宣扬持诵观音神咒护佑国土、消除恶业、治愈病痛，获得长寿，获取财宝，以及往生十方净土或阿弥陀净土等等，都是与民众日常愿望紧密相连的利益。由世家大族作为“家庙”“家窟”修建的洞窟，虽然使用了不同的密教观音经变，也形成了固定的布局与模式，但是对于密教观音信仰的可能依然是建立在对观音菩萨救难认知的基础上。

### （三）观音瑞像

此期敦煌石窟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观音图像：观音瑞像。瑞像即是有灵验现象的佛教造像，末法时代，瑞像显灵成为护持佛法与一方民众的重要信仰对象。敦煌石窟中 P.3033 背、P.3352、S.5659、S.2113 四篇《瑞像记》与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印度新德里博物馆的 Ch.xxii.0023 号《瑞像图》以及敦煌石窟中 231、236、237 窟西龕四披的瑞像即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在以佛像为主的瑞像中，观音菩萨像颇值得注意。P.3352 中有“如意轮菩萨手掌日月”“观世音菩萨（于蒲特山放光成道瑞像）”、S.5659 有“观世音菩萨助于阆国”的记载。据学者研究四篇《瑞像记》为对洞窟题记的抄写<sup>②</sup>，对应到洞窟壁画与绢画《瑞像图》可以看到对观音瑞像的表现方式。231 窟、237 窟西龕之中各有两身观音瑞像，一身为“天竺摩加国观世音”为四臂立像，菩萨头戴“山字形”宝冠，上两臂手托绘有金乌和桂树的日月，一手于胸前结说法印，一手下垂提净瓶。一身为“观世音菩萨于蒲特山放光成道瑞像”，形象与“摩加国观音”形象基本一致，只是没有上举日月的两臂。可见，此两种观音瑞像当为一个底本变化而来。

对应 Ch.xxii.0023 号《瑞像图》，能够找到洞窟中观音瑞像的原型（封二图 3）：观音正立于山石之间，头戴有立佛的化佛冠，脸庞方圆，眉心见有慈眼，上身赤裸，佩戴铃铛装饰的短项圈，一手于胸前提净瓶，一手持莲花。下身系透明的长裙，赤足立于莲花之上。整组造像洋溢着浓郁的南亚造像风格。通过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瑞像图》中聚积的瑞像基本上是对各地原有造像的图写<sup>③</sup>，因此这身观音瑞像可能是对蒲特山放光成道像的摹写。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于位于南亚的秣罗矩吒国布咀落迦山记载如下：“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历山登水，忘其艰险，能达之者，尽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请见，或作自在天形，或为涂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愿”。《瑞像图》中观音瑞像呈现出地域风格与布咀落迦山的地理位置以及最早的观音信仰出现之地，三者契合。

### （四）161 窟与观音修行院

世家大族开凿的洞窟中展现了普通民众对观音的信仰状况，而在针对不同人群上，敦煌石窟也展现了它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位于莫高窟石窟群中位置最高 161 窟（封二图 4），与 156、158、159 形成一组石窟。该窟为一中心佛坛窟，佛坛上残存有吐蕃装供养人的塑像，可知其年代为吐蕃统治时期，窟顶绘千手观音曼荼罗一铺，四披各有一铺观音曼荼罗。西壁中央绘十一面观音曼荼罗、南壁中央绘文殊变、北壁中央画普贤变，各环绕 28 组菩萨会。东

① 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07—116 页。

② 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阆》，载《于阆史丛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92 页。

③ 参见 Lokesh.Chandra and Nirmala.Sharma, *Buddhist Paintings of Tun-huang in the National Museum New Delhi*, Niyogi Books 2012.

壁门上绘观音经变、环绕菩萨会 12 组，显然这是一个以密教观音为主题的洞窟。台湾学者郭祐孟认为此窟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为纪念自己的老师法成而建的功德窟，甚至可能是法成生前的专用密窟。<sup>①</sup> 而后沙武田根据法成在敦煌的活动，进一步论证这一说法<sup>②</sup>。

在藏文古籍《第吾宗教源流》中有 8 世纪中后期，吐蕃以桑耶寺为中心，在东西南北四方修建四大石窟修行禅院的记载：“东方的达拉扎菩石窟，由哲·杰威洛智创建并住持；南方的达隆与森格隆石窟，由朗·贝吉森格创建并住持；西方的扎玛波腾菩石窟，由努·南卡宁布创建并住持；北方的阿雅巴罗修行院，由安兰·嘉瓦确央创建并住持。”安兰·嘉瓦确央是修持观世音法门的大成就者，阿雅巴罗修行院即圣观世音修行院，德吉卓玛将之比定为以莫高窟 161 窟为中心的一组石窟群<sup>③</sup>。虽然 161 窟的众多菩萨沿袭着唐代密教菩萨的风格，并且在南北两壁安置文殊、普贤的做法更近于汉地华严信仰的做法。但是藏文文献中关于敦煌的北方观世音修行院的记载，解释了藏经洞中吐蕃统治时期大量观音类典籍出现的原因，此期的敦煌也是汉藏观音信仰互相融合之地。

### 三、护国思想与西域的交流

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早期的 154 窟，以窟内绘制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及其体现的护国思想为学者所重，南壁西侧的空余处绘制着上下两组尊像。上部为毗沙门天王与观世音菩萨的组合，下部为毗沙门天王与功德天女。上下两身毗沙门天王样式一致，观音菩萨带有盛唐的风格，而功德天女佩戴头冠的方式则为于阗女子的常见装扮。毗沙门天王与功德天女为于阗的著名神祇，在《于阗教法史》、《于阗国授记》等文献中多次出现，而这组图像所包含的明显的于阗因素，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毗沙门天王与观音组合的含义。

在汉地的文化传统中，对于观世音菩萨的信仰由来已久，观音救危度厄的形象早已深入唐人心中。在盛唐时所译的大量关于密教观音的经典、流行的密教观音像，很多也具有护国、免除兵灾的思想<sup>④</sup>。观世音与毗沙门天王在尊像上的组合在四川地区多有发现，如巴中石窟群就有数龕观音与毗沙门天王的组合。而巴中地区是唐代著名古道米仓道的途径之所，大量长安地区流行的造像题材在官员与僧侣的带动下传播到四川腹地。而在于阗也有对观音菩萨的信仰。

《于阗教法史》中叙述于阗王“地乳”被其父抛弃到“圣观音菩萨居住的后面”<sup>⑤</sup>。可见观音殿或观音堂在于阗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样在该部典籍中涉及到了安住于阗的八大菩萨，分别为“金刚手即秘密主，今仍于牛头山最上层常边住，圣观音住于萨野住，虚空藏于萨迦耶仙住，……”<sup>⑥</sup> 这种菩萨安住的思想当来自于《华严经》，据“诸菩萨住处品”中载，释迦吩咐各位守护神与诸菩萨守护阎浮提世界的各个角落，由此经典发展而来的是菩萨的住地、道场思想。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在中唐时已经确立，普贤菩萨的住地峨眉山在北宋时确立，而观音菩萨除了《华严经》中记载的“补怛洛迦”之外，其住地在于阗被本土化。“萨野”这一位置已不可考，但可知观音信仰在此地的根深蒂固，并且已经发展为于阗本地的护持菩萨。

由此看来 154 窟的两组尊像表现的是于阗与汉地共同的守护者。在吐蕃统治敦煌的前期，

① 郭祐孟：《晚唐观音法门的开展——以敦煌莫高窟 161 窟为中心》，《圆光佛学学报》，2003 年第 8 期。

② 沙武田：《敦煌吐蕃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功德窟考》，《中国藏学》，2008 年第 3 期，第 40—47 页。

③ 德吉卓玛：《吐蕃时期的敦煌观音修行院之考》，《西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64—72 页。

④ 颜娟英：《唐代十一面观音图像与信仰》，《佛学研究中心学报》2006 年，第 89—111 页。

⑤ 朱丽双：《敦煌藏文文书 P.t.960 所记于阗建国传说——于阗教法史译注之二》，《敦煌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111 页。

⑥ 朱丽双：《敦煌藏文文书 P.t.960 所记守护于阗之神灵——于阗教法史译注之三》，《敦煌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116 页。

各地战争频繁，毗沙门天王、功德天、观音菩萨所体现的护持国土、护持佛法的思想得到了敦煌民众的认可与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于阆装束的功德天也短暂出现在了这一时期的千手千眼观音图像中，功德天为千手千眼观音图像中的常见眷属，通常与婆薮仙左右配置于千手观音之前。在吐蕃占领敦煌之前完工的148窟（776），东壁门上方的千手观音曼荼罗，其中的功德天为典型的汉装女子，身着广袖翻领衫，发髻精巧。而到了吐蕃统治敦煌之后，在144、358窟等窟中出现的功德天变为身着紧身广袖上衣，在方形冠上披覆头巾的装扮。但是在中原、四川地区等地，毗沙门天王的女眷依然是长袖盘发的汉族女子装扮。显然于阆装束的功德天只是出现在敦煌的这一特殊时期，并没有传播到中原地区。

于阆本土的观音信仰除了受《华严经》影响而产生的护持国土思想外，也有具体到保护妇女儿童不受胎死腹中、难产、小儿夭亡等苦难的作用（于阆人认为这些情况是鬼神作祟），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于阆文《对治十五鬼护身符》的开头即为观自在菩萨向释迦祈请，在结尾处写有“此护持（经）名曰《对治十五鬼》，尊者观自在菩萨于佛前宣说，以悲悯众生，若有女子不能生育，或者无男童，无儿子，或者石女，或者她的儿子不能成活，或者腹中不能怀子，或者丈夫对她十分粗暴。只要（她）携带此明咒，尊者观自在菩萨将如此保佑她，无论她有何种愿望，皆可得实现。”<sup>①</sup>此卷由观音菩萨宣说的陀罗尼为一位于阆贵妇所有，生动展示了观音护生的功能。

于阆的密教观音，除了文献中记载的尉迟乙僧在长安慈恩寺塔画千手千眼观音之外，近年来在新疆和田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中发现了一片千手观音的壁画残片（封二图5），观音为正面，眉心及手心中绘有慈眼，残存的持物有莲花上的坐佛、佛钵、以及内有玉兔捣药的月亮。月亮是千手观音的常见持物，佛钵与莲花坐佛不见于经典、仪轨，可能为千手观音的民间表现形式。

#### 四、八大菩萨曼荼罗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新样式

敦煌古藏文文献 P.t.0081-2、P.t.0104V、No.317I 三纸合为一经，藏文译名为《圣八曼陀罗大乘经》，此经北宋法贤译为汉文，名为《佛说八大菩萨曼荼罗经》<sup>②</sup>，经中记录了佛在补陀落迦山圣观自在菩萨宫中，为众多菩萨演说“所有五逆重罪，一切诸恶皆除灭，而能成就无上胜义”的八大菩萨曼荼罗咒。在八大菩萨曼荼罗中，主尊虽为毗卢遮那，但其说法处在补陀落迦山，观音又为首座，体现出了观音信仰在密教中的延伸。唐代著名密宗高僧不空曾翻译有《八大菩萨曼荼罗经》，为此经的异本。从敦煌文书和图像来看，不空本可能并未流传至敦煌。近年来，在青海玉树、西藏昌都等藏东地区发现有几例摩崖石刻的一佛八菩萨，其中有两例为纪年作品，时间皆为9世纪初，与榆林25窟的时代相去不远。因此，虽然在古藏文写本中《圣八曼陀罗大乘经》仅有一件，但确是吐蕃人的观音信仰传入敦煌的明证。

这一信仰不仅体现在经文上，更是体现在图像传播上。凿建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榆林25窟东壁壁画即是对这一经典的图绘。画面构图为长方形，主尊坐于正中，四尊菩萨上下二排。主尊头旁的T字形榜题框中用汉字写有“清净法身卢那舍佛”（封二图6）。主尊着菩萨装，头戴山字形宝冠，双手于腹前结禅定印。双臂间有禅思带缠绕，主尊的须弥座下伸出莲茎，向两侧蔓延。根据壁面残存的图像与1943—1944年间罗寄梅拍摄的照片的拼合，南北两

① 段晴：《对治十五鬼护身符》，《于阆·佛教·古卷》，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204—206页。

②（北宋）法贤译：《佛说八大菩萨曼荼罗经》，大正藏第20册，第676页。

侧的菩萨像与主尊共为“卢舍那佛并八大菩萨”。其中观世音菩萨位于主尊南侧内下方，“呈游戏坐于莲花座上，头戴化佛冠，左手抚膝，似提一宝瓶，右手持莲花枝。”<sup>①</sup>

除了榆林25窟之外，藏经洞绢画ch.0074号藏品（封二图7）也为表现一佛八菩萨的作品。画面中心为结禅定印、跏趺坐的菩萨形主尊，主尊左右各有四尊上下排列的菩萨，最上端的两尊题记剥落，余下的六身都有藏文的名号题记<sup>②</sup>。其中主尊左侧第三身榜题为“观音”，但是其持物为梵篋。但梵篋为文殊的典型图像特征，故榜题有误，观音当为主尊右侧第一尊，这一位置也符合《佛说八大菩萨曼荼罗经》中观音的重要身份。这幅作品绘制得简单而粗糙，但与榆林25窟为同一造像样式。对于这种新出现的菩萨样式，学界普遍认为是由吐蕃传入。

藏经洞中的绢纸画中也有部分同样样式的作品。第一类为单身的尊像画，如斯坦因的编号为ch.00376、ch.00377、ch.00401号藏品。第二类为密教题材的曼荼罗图像。如大英博物馆的Ch.lv.0024、Ch.xxii.0017、Ch.lvi.0034号藏品以及法国吉美博物馆的EO.1167金刚萨埵曼荼罗、EO.1131莲花部八尊曼荼罗<sup>③</sup>。第三类为胁侍菩萨像。在汉风明显的作品中混有吐蕃样式的菩萨。如836年，藏族僧人白央供养的一铺大型绢画，斯坦因编号为ch.xxxvii.004号，在药师佛两侧的胁侍菩萨即为吐蕃样式。并且这种菩萨样式在石窟中也有出现，如莫高窟369窟南壁金刚经变中的两身胁侍菩萨，反映出了新的造像样式对汉族石窟的渗入。

## 结 语

通过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中的观音图像的梳理、汉地与于阗在观音图像上的交流、新的菩萨样式的出现三个方面的讨论，我们能够看出在这样一个多民族交融的时代背景之下，观音菩萨的信仰已经根植于各族民众的内心，成为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共同的信仰。观音菩萨所具有的拔苦救难的愿力已经由“八难”扩展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患疾还是求往生，民众都会求助于观音菩萨。而在这个战争频繁的特殊时期，观音菩萨又具有了护卫国土、保佑亲人团聚的能力。据五代宋初时的敦煌文书S.5448《燉煌录》的记载：“次南山有观音菩萨会现之处，郡人每诣彼，必徒行来往，其恭敬如是。”<sup>④</sup>莫高窟及其附近的民众、僧众对观音菩萨虔诚的信仰也使得这里逐渐成为了观音的灵验之地。

（责任编辑 周广荣）

① 沙武田：《榆林25窟八大菩萨曼荼罗图像补遗》，《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

② [日本]田中公明：《敦煌出土の胎藏大日八大菩薩像》，《敦煌密教と美術》，京都：法藏馆，2000年，第20—38页。

③ [日本]田中公明著：《敦煌出土莲花部八尊曼荼罗》，刘永增译，《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第七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观音造像艺术



图1 45窟南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图2 148窟千手千眼观音经变



图3 Ch.xxii.0023号《瑞像图》观音瑞像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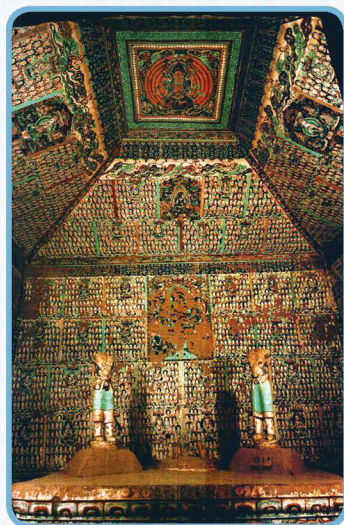


图4 161窟观音曼荼罗



图5 喀拉墩1号佛寺观音菩萨残片



下左：  
图6 榆林25窟 正壁主尊清净法身卢舍那佛



下右：  
图7 Ch.0074号绢画八大菩萨曼荼罗中的观音像

陈粟裕 供稿